

张汝民 樊峥 孟桂芳 编著

回望 长庆

——
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

杭州出版社



回望长庆

张汝民 樊峥 孟桂芳 编著



白氏长庆集 香山

元氏长庆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望长庆: 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 / 张汝民, 樊峥, 孟桂芳编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5.12

ISBN 7-80633-848-9

I.回… II.①张… ②樊… ③孟… III.城市道路—简介—杭州市 IV·K92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0008 号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曙光路 133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责任编辑 鲁 越

封面设计 赵 路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书 号 ISBN 7-80633-848-9/K·111

定 价 25.00 元





序

早在一年多以前,长庆街道已与我商量为街道编写一本书的计划和抱负。在中国,为街道而编书,既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欣喜逾常。因为这是一件历来少见的事。街道是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街道著书立说,按其属性是一种城市研究。在中国,城市研究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 and 大量的成果。就以杭州为例,南朝宋刘道真的《钱唐记》,大概是第一部研究这个城市的书。当然,当时尚无杭州之名,而作为杭州前身的钱唐县,自从秦建置以来,县址屡经迁移,也不知在今何处?加上《钱唐记》其书早已亡佚,至今仅留下其他古籍中引录的几句,对早年钱唐县的情况,已经很难推究了。北宋大中祥符(公元十一世纪初期),朝廷颁令各地修纂《图经》,杭州曾修成《祥符杭州图经》一部,可惜也早已亡佚,现在只留下后来几种志书所抄录的几十条而已。南宋在杭州定都,杭州(临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西湖胜景,于是,城市研究的著作如《梦粱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纷纷问世。加上著名的“临安三志”(乾道、淳祐、咸淳),杭州城市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不过“临安三志”之中,除《咸淳志》基本完整以外,其余两志已大多亡佚,而至今仍完整的《梦粱录》等三种,成为南宋杭州城市研究的瑰宝。

城市研究这个领域,不仅是在中国,国际学术界也是一个热门。其中还有不少研究中国历史城市的外国汉学家,他们在中国历史城市的研究中,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了由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①。此书收录了十多篇论文,都是好几

① 此书已有中译本,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位热衷于中国历史城市研究的国际汉学家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成果。当时,我们自己还处于一场愚蠢而残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但他们却潜心于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城市研究,发表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政治气氛趋于宽松,我开始应国际学术界的邀请出国访问讲学,亲眼目击了他们在城市研究中的方法和成果。其中有不少汉学家对杭州研究很有兴趣和造诣。我曾于 1985 年在日本国立大阪大学讲学半年以后撰写了一篇《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文章^①,其中提及:“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关于这方面,在上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的《后记》中,我们收入于此书的一篇,即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所撰的《宁波及其腹地》(*Ningpo and Its Hinteland*)为例,我指出:

早在施坚雅教授赠我此书以前,斯波教授已把他大作的油印本寄给了我,使我有机会对此多作了一点研究。另外,宁波离我工作的城市不远,我曾多次带领教研室的教师和几个班级的地理系学生,进行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的考察实习。使我十分诧异的是,在斯波的论文中发现,我所掌握的有关宁波这个城市的资料,竟远远不及一个外国学者。斯波从大量占有宁波历史资料开始,把这个城市历史上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等进行细致的比较和分析,再联系到与宁波发生经济关系的整个腹地,从而阐明宁波这个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成长的规律。施坚雅称赞这篇论文:“斯波关于这个城市的经济描述,在现有叙述传统的中国城市的英语著作中,可能是最完备的一种了。”我必须补充施坚雅的话,在我所见到的有关宁波城市研究的中文著作中,像斯波这样的论文也是凤毛麟角的。

^①《历史地理》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我在这篇《后记》中还提及了斯波写作此文时所运用的方法,其中之一是:

斯波曾经在通信中告诉过我关于他搜集资料所作的努力。因为他考虑到,早在清代,函馆(按:北海道的一个渔港)的渔船就在中国舟山群岛一带捕鱼。为了淡水和食品的补给,也许是为了风浪躲避、船舶修理等等原因,这些渔船中一定会有进入过宁波港口或附近的其他港口的。在这些早期的渔船中的诸如航海日记一类的资料中,必然会有涉及当时宁波港情况的记录,而这些古老的航海资料,或许可能在作为这些渔船基地的函馆找到。我不知道斯波教授后来有没有因此跑到遥远的北海道去,但是我认为像这样千方百计搜求资料的精神,正是这些作者们之所以在资料问题上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重要原因。

斯波教授不仅是对于宁波的研究取得如上述的丰硕成果,而且对于杭州的研究,特别是南宋的杭州,他也是极感兴趣并获得出色成果的。他通过对上述各种南宋杭州历史文献的钻研,运用历史城市研究的方法,撰写了《宋都杭州的城市生态》一文^①,把当时杭州城市各区域按其职能的差异,分成官绅区、军营区、补给区、经济中心区这样四个生态分区,每区都有精详的记叙和分析,并绘制了五幅细致的地图。斯波此文,可能是杭州历史城市研究中第一位进行城市内部区域划分的成果。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我到国外访问讲学以后,在历次出访中,我都着意于国际汉学家在城市研究中(包括对中国的城市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去国外不少大学讲学,把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提供给国外学者参考,同时当然也要吸取他们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研究

^① 原载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二辑,1984年。已有中译本,胡德芬译,《历史地理》第六辑。

经验。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国际交流,是有裨于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

对于国际学者城市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在我多次出访的体会中,感到在三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第一是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常常通过现象,寻求一些规律性的事物。把这些事物加以归纳总结,从而得出历史城市研究中的若干理论性的结果。例如施坚雅在其对中国历史城市的研究中所总结的关于中国历史上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所谓“中世纪城市革命”的理论。我曾在我所主编的《中国都城辞典》^①中,把这种施坚雅的创见列成专条,因为他总结的这种现象,确实符合中国历史城市发展的事实,而且已为中外城市研究者所赞同:

中世纪城市革命,这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在其主编的大型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中提出的有关中国历史城市发展的理论。所谓“中世纪城市革命”,是指从唐末到宋初在中国发生的一种市场与城市化的革命。这种革命的影响,兼及大都城和中小城镇。其主要现象为:一、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立在县城的规定;二、官市组织衰落,终至瓦解;三、坊市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以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交易买卖;四、某些城市迅速扩大,城郊商业蓬勃发展;五、出现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大批中小城镇。按历史上中国城市的重要标志是城垣,“中世纪城市革命”以前的城市格局,政治中心如皇室和州(郡)衙门均位于城垣中心。在“中世纪城市革命”以后,这种城市格局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首都为例,北宋以前的皇室必须位于都城中心,但北宋、南宋与明初期的首都就打

^①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破了这种格局。明清北京虽然仍以皇室为中心,但内外城和附郭均有发达的商业区,已经完全不同与汉唐首都。

又如日本学者狩野千秋在其所著《马雅的神殿城市》^①一书中,曾博览世界群籍,归纳了古代城市形成的条件。我在拙编《中国历史名城》^②一书的《序言》中,曾把他们这种研究成果加以介绍:

综合过去西欧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意见,把古代城市形成的条件,归纳为下列七个方面:一、最原始的国家组织与王权的确立;二、稠密的人口;三、社会阶级的分化与职业的专业化;四、巨大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建造;五、文字、金属器的发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六、由于剩余物质的生产而出现了有余暇从事知识性的活动;七、工商业与贸易组织的发达。

此外,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是求得城市发展理论的一种事半功倍的研究方法。不少有关城市发展的规律性事物,往往从比较研究中发现。我有幸于1985年在广岛结识了日本地理学界的前辈、广岛大学名誉教授米仓二郎先生,他是日本第一代地理学家、京都帝国大学小川琢治的高足,当时已年届八旬。由于曾多次去印度讲学,我们之间可以随意用英语交谈。他给予我以城市之间比较研究的启发,使我茅塞顿开。杭州大学曾于1987年特邀他到中国讲学,他虽然高龄而身体称健,在杭州大学讲了几场“中国与印度若干城市的比较研究”,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的卓识和创导,我自己在城市研究中也开始重视这种研究方法,并于1989年在广岛大学客座教授任上讲出“比较城市研究”的课程。

国际学术界城市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占有和运用的资料丰富,而且这些资料都经过筛选,即所谓言必有据。这方面不妨以地方志的修纂为例,因为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在地方志

① 日本每日新闻社 1974 年出版。

②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修纂中曾获得了很大发展。地方志虽然涉及面兼于城乡,但城市仍是其记叙的主要地域。地方志是什么性质的文献?在这方面,胡乔木的话是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志,应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①由于地方志的性质是一种“资料汇集”,所以我在拙著《陈桥驿方志论集》^②卷首《序言》中特别指出:“方志的可贵在于资料,方志的生命力也在于资料。”当然,这些资料绝不是东拼西凑、滥竽充数的,而是必须按胡乔木所说“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由于地方志有大量城市研究的内容,所以我要把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地方志在资料数量上作了抽样比较。在中国,我选择了曾经获得全国一等奖的《慈溪县志》^③;在日本,我选择了我几次在那里讲学的《广岛新史》^④,撰成一篇五万多字的长文^⑤。在此,我以字数作为资料的计量依据进行这两部都是近年新修的志书的比较。《慈溪县志》在当时算是篇幅较大的,以全县面积与志书字数相比,每1平方公里土地有0.13万字的记叙,而广岛的志书则大大超过慈溪,每1平方公里土地有11.2万字的记叙。以此一例,足见我们的城市研究,在资料数量方面与国际上存在较大的差距。

国际学术界在城市研究这门学问上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他们在研究对象中的不断向城市领域的纵深发展。在过去,所谓城市研究,其对象总是一个城市,甚或一组城市群。地域范围是较大的,内容也相当宏观。1983年,我应聘担任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在该校大学院(研究生院)

① 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引胡乔木1986年12月24日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方志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②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③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④ 广岛市史编委会1984—1986出版发生年(全套共十三册)。

⑤ 《中日两国地方志的比较研究——中国慈溪市与日本广岛市的地方志修纂》,《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讲课。其时,我所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①刚刚出版,出版社委托我带此书一批到日本交流,因此我才对日本的城市研究有所留意。发现他们对自己本国的城市研究,除了在研究对象上已经扩展到附属于城市的町(镇)、村等以外,在城市内部,他们的研究已经深入街区。例如写“银座”的专文和专著就有好几种,当然,“银座”是我多次走过的东京名街,犹如中国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和上海的南京路,为这样的街道撰文著书,不足为异(但我未曾读到过王府井大街和南京路的专书)。当然让我注意的是,他们也写了不少一般城市的街区,而且记叙翔实,分析细致。所以,我虽然把新出版的《中国六大古都》遵出版社之嘱分赠学术界朋友,但是从城市研究的角度,我确实感到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不小。

以上阐述的关于国际学术界在城市研究中值得我们重视的三个方面,显然都是这个领域中我们与国际行情的差距并应该迎头赶上的。现在,当我读完了《回望长庆》这部书稿以后,由于受此书的触动,又对我们近年来的城市研究作了一番回顾与思考。我感到一种新的慰藉,因为近年以来,我所触及的国内学术界的城市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从上述第一方面来说,记得我80岁之年,承浙江大学为我举办了一次“陈桥驿先生八十寿辰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与发展研讨会”。我的朋友们,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前来参加祝寿活动,并且带来了论文,从城市研究的理论和规律性角度进行探讨的也有几篇。其中如从北京来的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王守春教授,他运用电脑和屏幕,现场宣讲了《中国若干历史城市的中心轴结构与都市形态》^②的论文,就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城市研究作品,得到与会学者的深切关注。关于上述第二方面,即在城市研究资料的大量占有和运用方面,

①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 此文后来发表于《东チジチの都市形态と文明史》,千田稔编,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发行出版,2002年。



近年出版的不少志书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例如河南省的《洛阳市志》，全志十八巨册，字数达一千数百万，记叙十分详尽，所以也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现在回到《回望长庆》的本题上来。当著者们与我商讨为这个街道写书之时，我虽然高兴，但是思想上是把此书作为一种街坊志考虑的。当然，对于我们的城市研究来说，街坊志或坊里志也是一种新生事物，也是值得推崇和提倡的，所以我在当时就感到快慰和满意。此外，我同时也考虑到，中国从汉武帝建元之年（公元前140年辛丑）起，直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历代帝王都有年号，这是历史纪年中的一件常事，何况干支纪年和公历纪年都可以对照，所以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长庆”，无非是唐穆宗李恒的年号，先后不过四年（公元821—824年），但对于杭州（也包括绍兴），它居然因缘机会，成为一种宝贵的历史资源。帝王年号而成为资源，这实在是十分难得的机缘。由于在这个年号的短暂期间，两位名垂青史的杰出诗人白居易和元稹，一在杭州，一居绍兴，以他们的天赋智慧和广博见识，留下了《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这样两部不朽名著。现在我们翻开卷帙浩瀚的《二十四史》，有多少帝王将相列名其上，而其中值得检索查阅的，实在寥寥无几。而长庆年代的这两位诗坛巨子，他们假使仅仅是在杭州和绍兴做官，其结果无缘也是泯泯然留名于《二十四史》之中的湮废之流。正是因为这两部《长庆集》而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扬名后世，而让一个普通的帝王年号成为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今天不少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权贵和腰缠万贯、翻云覆雨的豪富来说，这实在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曹丕在其传世名作《典论·论文》^①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手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对于潜心于《回望长庆》的几位作者，也必将有感于此言也。

^①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四十。

前言已经提及，当作者们与我商讨为长庆街道写书时，我就深为我们在城市研究中能够推出一种得风气之先的街道志而踌躇满志。今天，当我读到这册以《回望长庆》为名的书稿时，更感到喜不自胜。作者们为此书设计了这样一个斯文雅致、寓意隽永的书名，作为一个街道的研究成果，确实别开生面、不同凡响。《回望长庆》是值得称赞的，它不仅为我国的 城市研究开创了城市以内一个小地区研究的先河，而从书名和内容来说，又摆脱了城市研究中长期以来沿袭的刻板形式，显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

由于城市研究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在这个学术圈子以外的学者和读者，多半不易理解。所以我特意花了较大的篇幅，介绍这门学问的属性和国内外研究概况，同时也为了对《回望长庆》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祝贺。

陈桥驿

2005年9月于浙江大学

回望长庆



引 论

社会在反思中觉醒,人类在回望中前进。

恐怕杭州城市很少再有哪个街道(地区)能够比下城区的长庆街道更值得人们回望、更值得人们书写的了。它那历史味道的名字就足以使人思想兴奋了。听听它的名字“长庆”,好一种吉祥之气!

回望长庆,会想起“殷富天下”的唐代。长庆是唐代的年号,由于唐穆宗(公元821—824年)年号为“长庆”,因而,人们也常常把这段时期称为唐朝长庆时代。一个吉祥的名字,一个世代传承的永恒的期待。

回望长庆,不能不提及中唐两位伟大诗人白居易和元稹。这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交情甚密的两位伟大诗坛艺人用平易的诗风书写着中唐的历史。因为,在一定的時候,历史常常得求助于诗人,飘摇不定的历史明明暗暗地搭建着过程,把过程中的欢庆、愁苦和感叹留给诗人,也正由于如此,诗人的感叹也就成了历史的旁证或明证。于是,白居易和元稹这两位情谊甚笃的伟大诗人在中唐历史的感叹声中便诞生了《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两部不朽的诗集,一段余味久远的历史。

回望长庆,最终还须驻足在杭州长庆街道(地区)的这片热土上,它坐落于人杰地灵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杭州美丽的天堂中,它是一个街区,一个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优秀的人文精神的街区,人们也常常称它为长庆地区或长庆街道。一个商业繁华的贸易之区,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充满诗意的栖息之所。有沉思,更有感叹。

回望长庆,不能不写西湖,可以说,杭州下城区长庆地区的命运和西湖命运紧紧相连。白居易对长庆地区的形成可以





说有着筚路蓝缕之功。唐代刺史白居易在长庆时代对西湖的疏浚,使西湖湖性发生了由天然湖泊到人工湖泊这一划时代的彻底转变。杭州城市本身及其腹地的长庆街道的孕育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自始至终都和西湖的变迁休戚相关。杭州被喻为“人间天堂”,这个“人间天堂”中的西湖在郁达夫的笔下更具有销魂之美。不仅是杭州的西湖在历代先贤的精心修理、装扮而愈发有着无法用笔墨形容的销魂魅力,而杭州华美的丝绸还有更多同样具有销魂之力。难怪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白居易在离任后由衷地流露心声:“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一半是西湖,那另外的一半又是什么呢?多才的诗人也没有回答,只是他给后人留下了足以充分驰骋想象的空间!但可以想象他是怀着怎样无限的眷恋之情离开杭州的。

“忆江南,最忆是杭州!”的确,“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丽西子湖,被国际友人誉为“灿烂的彩霞”和“东方的艺术之花”的多姿多彩的丝绸,具有独特魅力的吴越文化与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原文化在这里亲密地碰撞交融……长庆街道静卧于杭州古老的下城区,偎依着“众废而独存”历经世世代代人工洗礼愈加美丽的西子湖,焕发出绮丽的光芒,吸引着国内外众人。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从历史沿革中发现时间的意义,那就不难理解:长庆地区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的久远、深沉、历经沧桑;长庆地区的沿革也正是杭州城市的发展史和西湖的变迁史;长庆地区的文化品位也正体现在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传承的人文精神以及有待继续细细品味的文化魅力;杭州丝绸之所以具有久远“名冠天下”的历史也就是长庆街道的丝绸发展史,不断扩大的杭州市区、充满智慧的古桥、富有灵性的流水都见证着这个美丽的街道。在这里,丝绸的华美与西湖的秀丽交相辉映,悠久的历史情节与现代的时尚水乳交融,幻化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血脉。长庆地区的丝绸已经成为杭州丝绸的代名词,成为长庆地区奉献给世界

独特的礼物。

长庆街道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有着充满历史味道的名字“长庆”，它传承着世代所期待的永恒话题，它寄托着多少不朽的感叹和后人不停续写新生活的坚定信念。无数的历史欢庆、无数的历史寂寞以及对未来的无数期待，铸就了强悍的历史传承。于是，由此所沉淀的时代智慧便构成了一种生命力，升华为一种长庆精神，在当地人们的栖息之所生根发芽、发扬光大。

回望长庆，回望这种美好乐观的心愿，回望熔融于血脉的令人激情四射的一种精神。回望长庆，踏着历史的足迹拾起一点点历史的记忆。

回望长庆，漫长的历史沿革会给人们带来久远的振奋和思考！

长庆街道特定的区位条件，悠久的历史，为造就灿烂的文化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为现代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在 1000 多年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而又辉煌灿烂的社会文明，积聚了厚重的文化沉淀。

一个地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完备的社会有机体，不仅需要发达的经济，而且也需要发达的文化。所以，发掘地区本身丰富的文化资源，展示人文风情，弘扬历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灿烂的文化总是与古老的历史结缘，富有历史气息和众多历史渊源的名字、古老的丝绸、先进独特的教育文脉、丰富的古桥及清澈的流水以及作为灵魂的生生不息、拼搏奋进的居民……形成长庆地位。



